

中国现代文学 编年史 (1895—1949)

总主编 刘勇 李怡

第七卷 1930—1933

本卷主编 钱振纲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中国现代文学 编年史 (1895—1949)

总主编 刘勇 李怡

第七卷 1930—1933

本卷主编 钱振纲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现代文学编年史·第七卷 / 刘勇, 李怡总主编.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14.12
ISBN 978-7-5039-5924-0

I. ①中… II. ①刘… ②李… III. ①中国文学—现
代文学史—1930~1933 IV. ①I209.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77260号

中国现代文学编年史·第七卷

总主编 刘勇 李怡
本卷主编 钱振纲
责任编辑 董良敏
封面设计 姚雪媛
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八条52号 (100700)
网 址 www.whyscbs.com
电子邮箱 whysbooks@263.net
电 话 (010) 84057666 (总编室) 84057667 (办公室)
(010) 84057691—84057699 (发行部)
传 真 (010) 84057660 (总编室) 84057670 (办公室)
(010) 84057690 (发行部)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国英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7年9月第1版
印 次 2017年9月第1次印刷
印 张 21
字 数 350千字
开 本 710毫米×1000毫米 1/16
书 号 ISBN 978-7-5039-5924-0
定 价 60.00元

目
录

1930年	二月	141	本卷主要作家
七月 1	三月	144	人名索引 283
八月 9	四月	149	
九月 18	五月	156	本卷后记 307
十月 27	六月	164	
十一月 37	七月	168	
十二月 42	八月	174	
本年 47	九月	179	
	十月	184	
	十一月	189	
1931年	十二月	196	
一月 48	本年	202	
二月 57			
三月 61			
四月 65	1933年		
五月 72	一月	208	
六月 76	二月	215	
七月 83	三月	221	
八月 91	四月	228	
九月 97	五月	232	
十月 105	六月	239	
十一月 113	七月	245	
十二月 120	八月	254	
本年 129	九月	260	
	十月	264	
	十一月	271	
1932年	十二月	276	
一月 132			

1930年

七月

1日，郁达夫的小说《杨梅烧酒》发表在《北新》第4卷第13号。该作品写一位书生早年有实业救国的梦，在他沦为穷教书匠、与友人喝得酩酊大醉时，都依然未曾把这个梦破灭掉。最后因为争着付酒账而发怒，竟然与客人扭打起来。

同日，茅盾的杂文《青年苦闷的分析》发表在《中学生》第7号，署名“止敬”。

叶圣陶在《中学生》月刊第6号发表散文《假如我有一个弟弟》，署名“郢生”，初收于1931年9月新中国书局版《脚步集》。同日，叶圣陶在《妇女杂志》月刊第16卷第7号发表译诗《伫望》、《荷马之教》、《风》，署名“孟言”。

毅真的理论批评《几位当代中国女小说家》发表在《妇女杂志》第16卷第7期。

郁达夫的《中学生向那里走——中学生的出路问题》发表在《中学生》月刊第6号的“中国现代中学生的出路”栏目。

茅盾的译著《文凭》发表在《妇女杂志》第16卷第7—11号、第17卷第1号，署名“沈余”。在该译著引言中，茅盾指出，《文凭》“将乡村中所听到的都市的宏壮的呼声用很美妙的文情表达出来，比之别的更出名的伟大作家亦不多让罢”。

夏莱蒂翻译的美国作家皮尔斯的小说《天空中的骑兵》发表在《北新》第4卷第13期。

6日，鲁迅参观时代美术社展览会，捐1元。

鲁迅接待好友许寿裳及其长子许世瑛来访。许寿裳赠给鲁迅一张三十年前在东京时与鲁迅及邵明之、陈公侠合影的复制照片。

7日，老舍于上午9点钟应邀到北平师范大学讲演，题目为《论创作》。

周作人所作的《专斋随笔一、反书石刻，二、文字的魔力（小品）》发表在《骆驼草》第9期，署名“岂明”。该文初收于《看云集》。

冯至的《星期五的夜晚》、《等待》发表在《骆驼草》第9期。

欧阳予倩翻译的日本岸田国土的《包多丽许研究》，继本年6月之后在广州《民国日报》副刊《戏剧研究》继续连载。收入1931年5月广州泰山书店出版的《予倩论剧》。

10日，章克标的理论批评《关于夏目漱石》发表在《小说月报》第21卷第7号。

14日，冯至的诗《塞尔维亚民歌》发表在《骆驼草》第10期。

15日，王独清主编的托派刊物《展开》在上海创刊，主要撰稿人有余慕陶、王独清、王实味等。该刊为综合性半月刊，署名“展开社编辑”，实为王独清主编，由展开社出版，文艺出版社发行。第1、2期为合刊，同年12月20日出第3期后终刊。所载较重要的作品有王独清的《上海的忧郁》、《创造社——我和它的始终与它的总账》，黄药眠的《工人之家》，王实味的《三代》、《握别》等。

16日，缪崇群的小说《猫》发表在《北新》第4卷第14期。

钱歌川的散文《含泪的微笑》、胡秋原的理论批评《蒲力汉诺夫论艺术之本质》、苏读余的理论批评《冲出云围的月亮》、桐华的理论批评《中国文艺论战》发表在《现代文学》创刊号。

沈海翻译的苏联诗人马雅可夫斯基的诗歌《我们的进行曲》发表在《北新》第4卷第14期。

肖崇素翻译的日本作家林房雄的小说《凯夫剧场的暗杀》发表在《北新》第4卷第14期。

李青崖、陈定深翻译的法国作家杜哈美的小说《调节运输的车站》发表在《现代文学》创刊号。

汪馥泉翻译的日本理论家冈泽秀虎的《关于文学史中的社会学的方法》发表

在《现代文学》创刊号。

17日，周作人翻译的古希腊海罗达斯作的拟曲《熟师》，载1930年7月28日《骆驼草》第12期，署名“岂明”。

21日，冯至的散文《父亲的生日》发表在《骆驼草》第11期。

23日，周作人翻译的《关于蝙蝠附记》（附记），载1930年8月4日《骆驼草》第13期，署名“岂明”，初收于《看云集》。

24日，俞平伯作《贤明的——聪明的父母（讲演词）》，载1930年8月4日《骆驼草》（周刊）第13期，署名“平伯”，初收于《燕郊集》。

26日，沈从文作《我们怎样去读新诗》，载1930年10月《现代学生》第1卷第1号，署名“沈从文”，初收于《文集》第12卷。

28日，冯至的散文《C君来访》发表在《骆驼草》第11期。

29日，叶圣陶、胡默林、王伯祥同访朱自清下榻处俭德储蓄会，和朱自清共赴新乐府看昆曲，为朱自清点了姚传芾的《寻梦》，夜晚在金陵酒家饮酒。

30日，俞平伯收到周作人函和四张日本友人在山口萩及久经两地拍摄的传说为杨贵妃的照片。

刘大白作《致蔚南书》，收于1932年5月上海大夏书局《白屋书信》（五十三）。

本月

由国民党出钱津贴，王平陵、钟天心、缪崇群、左恭等主持的“中国文艺社”在南京成立。这几个人的情况是比较复杂的。王平陵在20世纪20年代就小有文名。1929年他开始主编南京《中央日报》的两个副刊《大道》和《青白》，与国民党联系密切。《大道》上常刊登叶楚伦的文章。王平陵是赞成“三民主义”文艺政策的。不过，他对于民族主义文艺运动也不反对，而且还积极响应。《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宣言》在1930年6月29日出版的《前锋周报》第2期刚刚刊登了上半部分，他就将其在1930年7月4日的《中央日报·大道》全文发表。缪崇群能写感伤缠绵的散文，在文艺思想上主张为艺术而艺术。左恭和钟天心主要在政界活动，两人在当时的政坛上属于胡汉民派。思扬在1931年9月出版的《文学导

报》第4期发表的《南京通讯》中说：“现在，因为蒋大人拘禁胡汉民，西山派赴粤反蒋，刘芦隐离职，所以中国文艺社的钟天心和左恭，都去广东了。”袁殊编辑的《文艺新闻》介绍说：“该社中央月有津贴一千二百元，主干为左恭等。因经济来源富裕，故能收集一批作家，如沈从文等。月有月刊，已出至第2卷第1期，格式颇似《小说月报》，闻每期约印五千册左右。另有周刊一种，系附于《中央日报》，占《大道》地位。”民族主义文艺运动的干将之一朱应鹏对中国文艺社的评论也很有参考价值。有位记者询问朱应鹏：“南京中国文艺社和民族文学，路线相同否？”朱应鹏回答说：“中国文艺社，是三民主义的文艺，他们的作品我看的极少，但是我知道它是由党的文艺政策所决定的。”综合上述情况，可以这样认为：中国文艺社是国民党支持的一个文艺社团，但不是一个民族主义文艺运动的社团。该社由国民党出资主办，鼓吹“三民主义文艺”，试图扼杀“革命文学”、“无产阶级文学”。这个社团对民族主义文艺运动采取了一种不公开支持也不加反对的态度。中国文艺社接受国民党津贴，编辑出版了《文艺月刊》，同时又在南京《中央日报》上创办副刊《文艺周刊》。中国文艺社自身的作者有王平陵、缪崇群、杨昌溪、钟天心、汪锡鹏、张道藩、李青崖、金满成等人。但由于自身缺少优秀作家，《文艺月刊》的编者主要采取的是向其他著名作家拉稿的编辑方针。由于这个刊物稿费优厚，也由于不少作家想利用这个刊物发表作品，所以刊物上名家的作品相当多。沈从文、老舍、巴金、戴望舒、臧克家、卞之琳、陈梦家、靳以、何其芳、李金发、鲁彦、洪深、施蛰存、李长之、马彦祥、袁牧之、林徽因、袁昌英、凌叔华、梁实秋等人都给这个刊物写过稿子，徐悲鸿则为刊物供给了一些画稿，这一点与前锋社的两个报刊有着明显的区别。这种编辑方针实际上也是为了与左翼作家争夺文坛。但由于色彩不够鲜明，所以前锋社只是把它视为“同路人”。范争波曾在《现代文学评论》第1卷第1期发表《民国十九年中国文坛之回顾》一文，其中说：“《文艺月刊》‘虽然不是民族主义文艺运动的主要刊物，但它是一个同路人’。”从1937年10月21日起，《文艺月刊》改为《文艺月刊·战时特刊》继续出版，为32开，不定期刊。这时成立了新的编委会，编委有汪辟疆、宗白华、商章孙、王平陵等，主编为徐仲年。《战时特刊》于1941年11月在重庆终刊，共出51期。由于当时已进入国共合作的抗战时期，《战时特刊》也表现出共同抗战的面貌。

“开展文艺社”在南京成立。这个社团是在南京国民党党部支持下由潘子农、曹剑萍、赵光涛、卜少夫等人组成的。这几个人在文学上都没有大的成就，但他们旗帜鲜明地参加了民族主义文艺运动。他们创办过《开展月刊》、《开展》周刊、《青年文艺》等报刊，在前期民族主义文艺运动中扮演了比较重要的角色。他们在杭州、宁波等地还设有分社。杭州的分社由娄子匡、刘湘女等人主持，宁波的分社由左询、周文夫等人主持。另外还有一种《民俗周刊》，关注民俗研究，由杭州钟敬文等人组织的“民俗学会”撰稿，开展文艺社负责编辑和出版。该社于1931年8月发生内讧。对此，刊登在袁殊编辑的《文艺新闻》第25号的文章《此之谓内讧也！开展社之分裂》有所记载：“前号载开展社之可注目的决议，系开除该社理事潘子农。据记者所知，潘为开展社之创办人……该社此次倒潘，系另一派人眼红潘之权高利重所致……现在内部竟已分裂，是否尚能按时领得某要人之津贴，则闻已成问题。但潘现在上海，闻又进行出版一《矛盾月刊》。”其中，《开展》周刊以《新京日报》副刊的形式出版，由卜少夫主编，出了30多期，刊登短小的作品。《青年文艺》以《中央日报》副刊的形式出版，由曹剑萍创办，所载文章也缺少分量。分裂后的开展社，随着《开展月刊》的终刊而告解散。

中国左翼美术家联盟成立，简称“美联”。它的成立，标志着革命、进步美术家的第一次大联合，组成了战斗集体。“美联”成立大会，是在法租界环龙路（今南昌路）靠近马思南路（今思南路）一座双开间房子二楼前厅举行的。当时设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宣传部直属的文化委员会（简称“文委”），委托夏衍代表“文委”参加“美联”成立大会。另外，中共党组织派党员张眺（耶林）参加大会并执行领导任务。与会的左翼美术家代表有许幸之、于海、胡以撰（一川）、周熙（江丰）、姚馥（夏朋）、沈叶沉（西苓）、刘露、张谔等。左翼戏剧家代表凌鹤出席了大会。大会由许幸之主持，于海做秘书。会上选出执行委员9人：许幸之、于海、张眺、江丰、胡一川、姚馥、沈叶沉、刘露、张谔。执行委员中又选出许幸之为主席，沈叶沉为副主席，于海为总干事。“美联”接受中国左翼文化界总同盟领导。“美联”成立后的日常工作，由许幸之、沈叶沉、于海几名常务执委负责。后因沈叶沉将更多精力用于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简称“剧联”）的工作，实际上是许幸之、于海主持日常工作。这时，张眺在“文委”工作，经常代表中国共产党联系和领导“美联”的工作。1932年3月，于海由张眺、洪灵菲介绍加

入中国共产党，之后任“美联”党团书记。张眺奉命调中央苏区赣东北工作，任闽浙赣省苏维埃政府教育部长，并常在《红色赣东北》报上发表美术作品，后在反国民党对苏区的军事围剿战斗中不幸牺牲。“美联”成立后总部设在中华艺术大学绘画科，有时也在盟员黄日东（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学生）、倪焕之（白鹅画会学员）两人在菜市街（今顺昌路）附近天祥里的宿舍里进行会议和活动。因为国民党政府查禁和镇压进步、革命文化的关系，“美联”的活动多半用单独接触的方式和各单位联系，由各单位的盟员小组分头以美术社团进行活动。当时的“美联”盟员小组有：上海美术专科学校盟员小组以张谔为骨干，有蔡若虹、洪叶（吴天）、钱文澜、施春瘦等参加；新华艺术专科学校盟员小组以陈烟桥为骨干，有陈铁耕、马达、王艺之等参加；中华艺术大学盟员小组以许幸之、沈叶沉为骨干，有卢炳炎、郑宝益、萧建初、王汝玉、梁白波等参加；上海一八艺社研究所盟员小组以胡一川、姚馥为骨干，有吴似鸿、艾青、李岫石、力扬、黄山定、顾鸿干全体社员参加；上海艺术大学和白鹅绘画研究所（原称“白鹅画会”）没有建立盟员小组，只有刘露、江丰、倪焕之等个别盟员的活动。此外，苏虹、易洁（叶华），以及加入中国籍的朝鲜人萍子等，也参加了“美联”。后因中华艺术大学被国民党当局查封，在该校执教的许幸之失业，随即去苏州，在苏州女子职业学校美术专修科执教，此时又成立“美联”苏州小组，由许幸之负责，成员有胡琴荪、胡笳笙、胡逸民等。在日本东京学习美术的留学生中也成立了“美联”东京分盟，成员有顾鸿干、黄新波、陈学书、官亦民等。1930年，夏衍于上海主编的《艺术》月刊和《沙仑》月刊发表了两篇有关左翼美术运动的论文：《新兴美术运动的任务》和《中国美术运动的展望》。两篇论文为“美联”主席许幸之所写，实际上代表了“美联”成立后所提出的左翼美术运动的理论和行动纲领。前文提出以下几条斗争纲领：一、我们必须立在一定的阶级立场，彻底和支配阶级及支配阶级所御用的美术政策斗争；二、我们必须把握辩证法唯物论，以克服支配阶级的艺术理论，并批评他们的艺术作品；三、我们必须强大我们的新兴艺术运动，并须充分地磨炼我们的作品，以凌驾于支配阶级的艺术作品；四、我们必须确立艺术与社会生活的关系，及其自身存在的价值，并须完成支配阶级所未完成的艺术启蒙运动。后文论述了左翼艺术运动的历史任务。全文分为五节：一、初期艺术运动的变革；二、艺术运动与艺术作品的检查；三、布尔乔亚（资产阶级）艺术运

动的末日；四、新兴美术运动的萌芽；五、新兴美术运动的出路。

周瘦鹃、严独鹤等共同主编的《中华》图画杂志月刊创刊，由上海东方图书出版社出版发行。周瘦鹃任文字主编，在创刊号上发表游记《雪窦山之春》，署名“周瘦鹃”；以及翻译美国葛兰博士的小说《真男子》，署名“周瘦鹃”。

冯雪峰、王学文一起主持由“左联”和“社联”合办的“暑期补习班”。学员主要是来自杭州及其他城市的青年学生。

中国左翼文化同盟（即“文总”）在上海成立。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左翼文化团体的联合组织。

南国社召开《卡门》座谈会，着重讨论“戏剧为谁服务”的问题。

《妇女杂志》主编杜就田辞职，叶圣陶接任。

巴金创作的短篇小说《洛伯尔先生》发表于《小说月报》第21卷第7号。该作品初收于1931年8月上海新中国书局版《复仇》，现收于《巴金文集》第7卷。小说叙述了法国穷音乐师洛伯尔与一位姑娘深沉而不幸的爱情故事。故事的背景发生在巴金生活过的马伦河畔；主人公洛伯尔的模特儿是拉封丹中学的音乐教师。《洛伯尔先生》在巴金文学创作生涯中起过独特的作用。1929年春写了《房东太太》和1930年6月完成了《死去的太阳》后，巴金对自己的创作很不满意，想从此搁笔不写小说了。但在写了《洛伯尔先生》后他改变了想法。他说，7月初的“某一夜，我忽然从梦中醒来。在黑暗中我还看见一些悲惨的景象，我的耳边也响着一片哭声。我不能再睡下去，就起来扭开电灯，在清静的夜里一口气写完那篇题作《洛伯尔先生》的短篇小说”。（《写作生活的回顾》）“这一篇开了端，所以我接连地写了好些短篇小说。”（《谈我的短篇小说》）

巴金作短篇小说《亡命》，载8月10日《东方杂志》第27卷第15号。该作品初收于1931年8月上海中国书局版《复仇》，现收于《巴金文集》第7卷。作品叙述了流亡巴黎的意大利青年尼可拉·发布里为追求理想而背井离乡、横遭驱逐、未婚妻被杀害的痛苦经历。巴金借发布里的故事倾吐了自己“漂泊”异邦受到“歧视”、“压迫”的痛苦，因而他很喜欢《亡命》。

黄仲苏的小说《音乐之泪》发表在《小说月报》第21卷第7号。

本月出版的诗集有《山花》（刘廷蔚著，北新书局）、《酸果》（徐雉著，上海光华书局）。

孙福熙的散文《巴黎捞针》发表在《小说月报》第21卷第7号，署名“春苔”。

本月出版的散文集有《海上闲话》(安世著，上海北新书局出版)，衣萍作序，内收散文31篇。

本月，于赓虞著散文诗合集《孤灵》由上海北社书局出版。柳丝、杨邨人著小说、诗歌、散文合集《烦恼与女子》由上海光华书店出版，内收小说《烦恼》。

本月出版的理论著作有：《法国文学史》(徐霞村著，上海北新书局)；《意大利文学ABC》(傅绍先著，上海ABC丛书社)；《我所见的叶圣陶》、《叶圣陶的短篇小说》(朱自清作)；《人权论集》(梁实秋、胡适、罗隆基合著，新月书店)；《戏剧的起源》(洪森，《南国月刊》第2卷第4期)；《世界语文学论》(巴金，连载于《绿光》第7卷第7、8期和第9、10期合刊)；《近代文学的反响》、《爱尔兰的新文学》(茅盾，《东方杂志》第17卷第6、7号)；《从资本主义到安那其主义》(社会科学丛刊)(巴金著，上海自由书店)，同年8月又由美国三藩市平社出版。该书分“序”及三部。第一部题为《今日》，含16章：你一生最向往的东西是什么、工钱制度、法律与政府、这制度怎样工作、失业、战争、教会与学校、正义、教会能够帮助你吗、改良派与政客、社会主义、二月革命、从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布尔塞维克、专政与革命、专政的把戏；第二部题为《安那其主义》，含5章：安那其主义是什么、安那其是否可能、安那其主义的社会、阶级斗争、革命的安那其主义；第三部题为《社会革命》，含8章：为什么要革命、社会革命、预备、工团的职务、原理与实行、消费、生产、革命之防卫。该书在研读、综合柏克曼寄赠的《安那其主义的ABC》的基础上，又结合自己的社会经验写成。这是巴金第一部也是最后一部从理论上全面、系统地阐述克鲁泡特金无政府主义原理的论著。

本月出版的翻译著作有《卖淫妇》([日]叶山嘉树著，张我军译，上海北新书局)，除作者小传外，有小说11篇。《费迦罗的婚礼》([法]博马舍著，柳木森、汪济译，上海图书编译馆)，该书又名《狂欢的一天》，系作者费迦罗三部曲之二。作品写伯爵企图诱骗费迦罗所钟爱的使女并想在使女身上“赎回”初夜权，于是就有了伯爵和费迦罗之间的冲突。作品主旨是“人民受着压迫，他们就会诅咒，会怒吼，会行动起来”。《雅歌》(吴曙天译，上海北新书局)，英汉对照，附有周作人《圣书与中国文学》、冯三昧《论雅歌》、薛冰《雅歌之文学研究》。《茵梦湖》

([德]施笃谟著,张友松译,上海北新书局),除译者序之外,内收作品9篇。小说《伊凡之死》([俄]托尔斯泰著,顾绶昌译,上海北新书局);《愁斯丹和绮瑟》(柏地耶述著,朱孟实译,上海开明书店);《战争》([德]雷思著,麦耶夫译,上海水沫书店);《难忘的爱侣》([俄]屠格涅夫著,袁嘉华译,上海北新书局),内收小说3篇:《咯,咯,咯》、《难忘的爱侣》、《客店》;《伟大的恋爱》([俄]柯仑泰著,周起应译,上海水沫书店)。论文集《艺术论》([俄]普列汉诺夫著,鲁迅译,上海光华书局),该书收作家论文4篇,并附有20年间的序文。鲁迅是据日本外村史郎的日译本重译;《〈丹东之死〉原序》([俄]托尔斯泰作,巴金译),载7月上海开明书店出版《丹东之死》。叙述原作者始据毕黑纳的悲剧《丹东之死》改编,后又“极力去掉……原剧借来的一切”,据“自身在俄国革命中的印象与经历……重新改作一次”的简况。本月还出版了译作《丹东之死》([俄]托尔斯泰作,十一幕话剧,开明书店)。

章克标翻译的日本作家夏目漱石的小说《哥儿》在《小说月报》第21卷第7—9期连载。作品写的是某地褪尽了学校的圣洁的色彩,反而有腐败的气息所弥漫笼罩,于是也出现了知识青年由个人义愤出发而最终走向反抗现实的活剧。

本月出版的其他作品有历史故事《法国大革命的故事》(巴金著,载《丹东之死》,开明书店);后收于1934年10月上海生活书店出版《沉默》(按:列入“附录”栏,小有改动,改题为《法国大革命的故事》),以生动、精练的语言叙述18世纪末法国人民大革命推翻“封建制度和王权”、三大党派(吉隆特党、山岳党、平原党)争权夺利和互相残杀、最后革命成果被资产阶级右翼保皇党篡夺的历史故事。作者认为“捣毁巴斯底狱”、“打倒封建制度”、“抵抗外国军队侵略以保卫法国的”英雄“就是法国民众”;认为大革命失败的主要教训是“离开了民众”,迷信“恐怖制度”和“专政压制”;称颂大革命的主要历史功绩是“自那天以来所有的君主顶上的圆光都消失了。全世界的人民都有了一个新的认识:没有那个戴王冠的怪物,人民也是能够生存的”。

八月

1日,光人的诗歌《夕阳之歌》发表在《北新》第4卷第5期。

沈善坚的理论批评《虹》发表在《开明》第2卷第13号。

4日，“左联”执行委员会通过《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新的形势及我们的任务》的决议，载8月15日《文化斗争》第1卷第1期，号召开展“工农兵通信运动”，“创造我们的报告文学”。决议因错误地估计“中国革命快要到高潮的时期”，因而认为：无产阶级文化运动虽然遭受日益严重的围剿和压迫，但依然加速发展。形势是“不管新月派怎样板起脸孔来说文学的尊严，也不管民族主义文学派怎样在叫嚣，也不管取消派怎样取消中国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然而，他们在蓬勃的革命斗争事实之前，只暴露自己的反动的真相，在群众中不会有多大的影响”。决议说：斗争使作家们学习了唯物辩证法和实际经验，“因此清算了文坛的封建关系，手工业式的小团体的组织以至它的意识，而形成统一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总机关左翼作家联盟”。“苏维埃文学运动”已从“这个血腥的时期开始”了。“我们号召‘左联’全体联盟员到工厂到农村到战线到社会的地下层中去”，开展“工农兵通信运动工作”，“从封锁了的地下层培养工人农民作家”。特别是在“左联”工作中，青年基础薄弱，是狭隘观念的表现。因此，“左联”要成为真正的斗争机关，“这个组织基础的重心应该移动到青年群众身上，渐次转移到工农身上”。“理论斗争没有充分地展开”，“作品内容缺乏现实社会的真实性”等，都是工作上的弱点和不好倾向。

“左联”执委会通过《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新的形势及我们的任务》的决议。决议错误地认为以占领长沙、攻打武汉等“武装暴动”为标志的“中国革命的高潮”，是“全人类解放斗争的伟大叙事诗，最后一卷的前奏曲”。决议检查了过去的创作，认为存在的弱点“是作品的内容缺乏现实社会的真实性。因为作家们依然没有和现实社会的斗争打成一块，形成生活的空虚，作品内容的没有力量”。

6日，鲁迅、郁达夫出席了内山完造在上海功德林举行的文艺漫谈会，会后参加晚宴并合影留念。

鲁迅到暑期文艺讲习会演讲，题为《美术上的写实主义》。

8日，曹剑萍、潘子农编辑的《开展月刊》创刊于南京。在发刊词《开端》一文中编者说：“民族主义文学，以水到渠成之势，无疑的成为支配中国文坛的一种新的势力了。我们应该帮同来开展着，给中国的文学，开展一条新的路径，建设起一种文学的革命的文学来。”第2期封三上的《本社紧要启事》又说：“查本社

《开展月刊》自创刊号出版以来，即为本党民族主义文艺运动，放一异彩。”在创刊号上，还以《中国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宣言》为标题，转载了前锋社的《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宣言》。这些都说明这是一个色彩鲜明的民族主义文艺运动的刊物。该刊共出12期，最后1期的出版时间是1931年11月15日。《开展月刊》内容侧重创作，一士的《回国》（第2期），潘子农的《决斗》（第4期）、《印捕之死》（第5期），刘祖澄的《血》（第4期）等小说，都能表现被压迫民族的苦痛。而刘祖澄的《挣扎在泥沼里的灵魂》（第8期）、《刹那的互裹》（第9期）则描写了人民之苦，技巧也较为圆熟。还有连载于第6、7、8、9期上的卜少夫的长篇小说《两种典型下的青年》也是值得注意的作品。刊物还刊登了一些论文，其中一士的《民族与文学》（创刊号）、程景颐的《民族主义文艺与国家主义文艺》（第5期）、孔鲁芹的《时代文艺论》（第8期）较为重要。刊物还设有“开展线下”栏目，刊登了不少杂文。第10、11期合刊是《民俗学专号》，由钟敬文、姜子匡编辑，刊载了一些民俗学方面的学术文章。

王沉予的小说《清凉的月夜》发表在《开展》创刊号。

开明翻译的俄国作家 Tolstoy 著的小说《永远在西伯利亚》发表在《开展》创刊号，署名“蒲牢”。

10日，茅盾的历史小说《豹子头林冲》发表在《小说月报》第21卷第8号。这篇作品以“历史的亡灵”曲折地映照了现实。体现出了茅盾历史小说的特色，取精用宏，在横切的断面中容纳深厚的内容，从而显示出窥一斑而见全豹的功夫。

钱公侠的小说《丝绵被头》发表在《小说月报》第21卷第8号。

周久荣翻译的苏联著名作家高尔基著的小说《幸运》发表在《文艺月刊》创刊号。

11日，废名的小说《桥》在《骆驼草》第14—19期连载。该作品写的是一个诗化的爱情故事。作品主要情节是主人公程小林出城郊游，与史琴子姑娘一见倾心。十年后程小林辍学返乡，依旧爱恋着史琴子，却同时又心折于史琴子的表妹细竹，爱她那种有别于琴子的“自然的有一个非人力的节奏”。于是，他在诗一样的境界中，与琴子、细竹看山赏塔、采花折柳以为“天下之务”，一派返璞归真景象。作品中的人物和清新的乡村的自然景物构成对应的关系，用冲淡、质朴的笔调表现尚未被现代社会污染的宗法制农村世界，表现带有古民风采的人物的淳

朴美德。凡叙述乡间儿女翁婆之事，皆流露出一种寂静的美。这种描写人美、景美的牧歌般意境，正是作者借鉴古典诗词的简练、含蓄、留空白等经验，转化成情节简单的散文化小说形式所特有的功能。

12日，国民党当局封闭平凡书店。不久，上海书业总会召集各书店代表开会，发表宣言，抗议当局压迫文化运动。

15日，《文化斗争》周刊在上海创刊，是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和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的机关刊物。“左联”诞生不久，先后出版过许多反对帝国主义及国民党当局的左翼刊物，但都遭查禁，如《新思潮》、《萌芽月刊》、《拓荒者》、《世界文化》、《巴尔底山》等。《文化斗争》就是在《巴尔底山》被明令查禁后，冲破重重困难，在残酷的环境中诞生的又一“左联”机关刊物。该刊于1930年8月15日正式创刊，16开12版。为了建立左翼文化自己的出版、发行阵地，坚持文化斗争，为免受当时国民党文化“围剿”，此刊没有署出版单位，应征的稿件也是由各左翼杂志转交的。它的诞生代表了中华民族新文化运动的方向，是中华民族斗争精神的火炬、奋进的号角。该刊由朱镜我和潘汉年主持。杂志第1期登有潘汉年的《本刊出版的意义及其使命》，谷荫（即朱镜我）的《反对帝国主义进攻红军》、《取消派与社会民主党》等。《文化斗争》的首页，文字设计颇具战斗性和号召力，统一中有变化，静中有动，柔中有刚，似刀枪、似匕首。“文化”二字内容与形式达到了完美的结合，“文”字上一点不写方点、圆点，而用小星，可谓寓意深刻：这是一颗战斗之“心”、燎原之“星”，体现了当时中国文化斗争的急剧尖锐和两个阵线的斗争。把“斗争”二字放置锁链之外，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点出了本刊的出版意义及其使命：冲破“围剿”，砸碎锁链，发出时代的最强音。《文化斗争》于同年8月22日出版了第2期，内容有《参加九七示威》、《战斗的随笔》、《读中国文学的新史料》等战斗篇章，对传播新文化、鼓舞人民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起到了积极作用。前后2期共有短文13篇，这份杂志究竟出了几期，不得而知。在该刊第1期的《本刊出版的意义及其使命》一文中，指明了它的任务是宣传马列主义和苏维埃文化运动的理论和实际，开展与一切非马克思主义、假马克思主义的斗争，使其成为左翼文化界的中心刊物。^①

① 朱时雨：《朱镜我与社联》，载《中国社联成立55周年纪念专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

徐庆誉在南京编辑出版了《长风》半月刊，编者署为“长风社”，由时事月报社发行。这个刊物于同年10月15日出版第5期后就停刊了。该刊第5期封二上的《紧要启事》说：“兹因编辑离京，一时无人负责，暂行停版。”这说明编者署为“长风社”乃是为了虚张声势，除了徐庆誉，“长风社”并无他人。《长风》是一个以提倡民族主义文艺为旗帜的刊物。在第1期《本刊之使命》中，编者说：本刊负有两个重大的使命：“一个是介绍世界文学，二是发扬民族精神。”而目的则在于“一面赈济学术的饥荒，一面唤起国人的民族意识，与人类的压迫者——帝国主义作最后的决战”。刊物中也有少量体现其编辑宗旨的作品。如第4期中，樵朋的独幕剧《扎兰诺尔》就是用民族主义的观点去描写发生于1929年10月的中苏战争的：一群中国士兵被苏俄军队俘虏了。苏俄士兵对他们百般侮辱……但一个俄国姑娘却对他认识的一个中国士兵能够为民族而战表示钦佩。这时，中国军队的大反攻也取得了胜利。不过这类作品实在非常少，因而其他民族主义文艺运动者对这个刊物并不满意。如《前锋周报》的编辑李锦轩在《长风》刚出版第3期时就撰文《给〈长风〉》，批评《长风》虽然拉了不少名家的稿件，但却很少发表真正有关民族主义文艺的文章。烽柱在发表于1930年11月15日《文艺月刊》第1卷第4期中的《我所见一九三〇年之几种刊物》中评论这个刊物时也说过：“它也是南京所出的一种刊物，编者似乎是一个多方面的追求者，内容涣散而没有什么精彩了。现在据说已经停刊。”

中国文艺社主办的《文艺月刊》在南京创办，至1937年8月1日出版第11卷第2期后终刊，共出73期，16开。编辑者主要是王平陵、左恭和缪崇群。

肖石君翻译的英国作家赛孟兹著的小说《魏尔伦》发表在《文艺月刊》创刊号。

16日，金枝的小说《我们狗与人》发表在《北新》第4卷第16期。

梁遇春的散文《救火队》发表在《现代文学》第1卷第2号。作者在小小的题目里开掘微言大义，引用外国的经典、警句，信手拈来，处处切题。在阐发议论时，他能从容自如地运用广博的知识，为文章服务，海阔天空，纵横捭阖，且行文富有感情，笔下虽波澜四起，却又不失法度。

吕叔湘翻译的捷克作家郝尔曼创作的小说《没孩子的夫妻》发表在《北新》第4卷第16期。